

510675

1986

ENWU
1986

6

人物



潘汉年、杨帆冤案举国皆知。人们一直以为潘、杨乃是一案。其实，康生、江青一伙要害杨帆，更有其特殊的原因。欲知其中底细，请读《杨帆冤案始末》。

一九四二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起了一组神秘的楼房，它周围拉起铁丝网，完全与外界隔绝。这就是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研制场所。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在这项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参加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记科学家费米和奥本海默》一文，介绍了这两位科学家的传奇性经历。

《从启蒙思想家到时代落伍者——严复述评》一文，历史地、客观地介绍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人物，材料丰富扎实，值得一读。





双月刊

杨帆冤案始末

陈允豪 丁兆甲 4

“烟火大师”于泽 张帆 35

祖国大地哺育了他

——记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刘天华 萧市 42

{杂谈} 吾岂为一人哀哉? 舒湮 149

{随笔} 谈赛金花与禁演《赛金花》 谢狱 151

共产党内的奇人异士

——陆久之谈蔡叔厚 沈涯夫 20

{怀念集} 忆思慕 洪谦 163

一身忠诚 一身智慧

——力学家钱伟长的片断经历 周文斌 13

诗歌——我生命的翅膀(续) 陈明远 77

学术上填补空白的人

——记文物专家王世襄 牟小东 66

熊十力先生散记 齐勇 154

郁达夫和佐藤春夫 黄清华 91

一位忧国忧民的文学家

——我所认识的黄秋耘 郭庆山 116

当代学人谈“我所喜欢和遵循的格言”及

“我喜爱的人物传记” 129

从启蒙思想家到时代落伍者——严复述评	林志浩 98
访梁漱溟问答录（五）	汪东林 49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记辛亥革命元勋曹亚伯先生	金绍先 165

人物文摘	李维汉同志谈反右派斗争（140）	六十年代对李
	维汉的两次批判（142）	孙犁《耕堂书衣文
	录》三则（142）	萨本栋的“杀不动”（144）

我和《孙子兵法》及其它	庞齐 132
从此天涯寻正道 ——记朱德在德国的活动片断	姚建平 73
张秀熟舌战王灵官	盛明 145
“赵老太婆”其人其事	邱载浮 171

他们参加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记科学家费米和奥本海默	张升华 122
-----------------------------------	---------

名家与名著	崔述和《考信录》	彭林 180
	荀悦与《汉纪》	刘隆有 184

诛奸斥佞的女诗人倪瑞璿	曹文柱 174
陈实功医德可师	苏侗志 178

补白	张謇和中国第一座博物馆（72）	刘少奇同志的
	一则轶事（187）	

本刊1986年总目录	188
------------	-----

杨帆冤案始末

陈允豪 丁兆甲

潘汉年、杨帆冤案举国皆知。人们总是把潘、杨连在一起，以为潘、杨冤狱乃是一案。其实潘、杨两人之案有其相同处，也有其不同处。康生、江青一伙要害杨帆，更有其特殊的原因。读者要知其中底细，请听我们慢慢道来。

杨帆原名石蕴华，又名殷杨、扬帆。江苏常熟县人，生于1912年。他的曾祖父是个画家，祖父是个数学家，父亲是个诗人。杨帆出身于家境破落的书香门第，十岁就会吟诗作赋，上中学时，在学校中是个略露才华的小小文人。1932年，杨帆二十岁，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专攻中国文学。在大学读书时，他经常写点诗词、散文、杂文在报纸上发表。他的学费来源就靠助学金和稿费。杨帆的走上革命道路，得力于北大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唐守愚。唐经常介绍杨帆读一些进步书刊，并介绍他参加进步的读书会和演剧活动。“一二·九”运动中，杨帆是北大学生会的执委和纠察队长，又是北大学生剧团的演员和导演，其艺术才能已初露头角。从北大毕业以后，他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办的，但学校中有不少思想进步的教授，其中有：马彦祥、曹禺、应云卫、吴祖光、黄佐临、许幸之等。共产党员田汉、阳翰笙也来讲课。那时杨帆还未参加共产党，但已与上海、南京的

党组织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就任戏剧学校训导委员会秘书之职，也是征得党组织同意的。这个特殊的工作职位，对他联系校内进步师生及社会上进步人士，组织救亡活动有很多便利。南京成立各界救国会时，杨帆被选为救国会的训练部长，并同上海的救国会保持密切联系。

1937年春，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戏剧学校中有共产党的秘密活动，逮捕了几个学生。杨帆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被迫出走，去上海，改名殷杨，参加了“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他就在党的领导下，鞠躬尽瘁，为党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

1937年冬，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以一个英国人为发行人的名义，办了一张《译报》，代替被迫停刊的《救亡日报》。杨帆担任《译报》国际版的编辑和特约记者。有一段时间，他用几个笔名撰稿，几乎每天都有他的作品发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很多杂文、散文和新闻报道。同时利用“记者”身份多方面活动，为我党在上海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作出了贡献，并进行调查日伪情况等重要秘密工作。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一再受到党组织的表扬。这为杨帆以后做公安保卫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

1939年初，新四军皖南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上海的党组织决定用“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剧团”的名义组织一批青年去皖南。“演剧团”共五十多人，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除杨帆外，还有王元化、杨弃是共产党员。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杨帆任支部书记。“演剧团”团长是吴大琨，杨帆是副团长。

1939年春节，“演剧团”从上海乘船到温州，就和温州地下党

取得联系，并和当地的剧团联合演出抗日救亡戏剧。这次演出轰动了温州，轰开了当地政治上沉闷的空气，对开展温州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不小作用。但在温州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三战区政治部派了特务以“副官”的名义来剧团，“陪同”演剧团一起去上饶。在上饶，剧团差一点被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部留下来。演剧团党支部研究了对策，说要到金华演出，金华也属三战区管辖，国民党没法阻拦。到了金华，正好周恩来同志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到浙江视察工作，也住在金华。杨帆通过当时正在金华的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取得联系。周恩来以接见上海群众代表的名义接见了演剧团全体人员，杨帆还单独和周恩来同志谈了两个小时，汇报了演剧团和他本人的情况，并请示、商谈进入皖南新四军地区的办法。

办法有了。演剧团以慰问前线驻军的名义，到了天目山南麓，巧妙地甩掉了特务，迅速翻过崇山峻岭，到了徽州。这时新四军派来汽车迎接，于是演剧团全体同志一路太平到了泾县新四军军部。

在新四军军部慰问演出以后，演剧团绝大部分团员都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其中不少人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光荣牺牲，有的人在“皖南事变”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杨帆本人原来准备完成任务以后回上海，后经过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说服，就留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改名为扬帆。开始在军政治部所属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后来又调任为军部秘书。

军部秘书的工作，使杨帆和项英接触更多。项英常问起上海文化界的情况。那时传闻蓝苹（即江青）在延安很“活跃”，项英也向杨帆问及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杨帆把他所知道的蓝苹在上海时政治思想上和生活上的不良表现都如实地讲了。项英叫他用扬帆的名字向中央写个报告。项英为此事还专门打了一个电报给延安党中央，反映蓝苹在上海的种种情况。这个电报落在了当时在延安负责保卫部门工作的与江青关系密切的康生手里。

三

1940年夏天，杨帆调到新四军军部军法处任科长，处长是李一氓同志。杨帆这个科专门负责军部驻地的保卫工作。在这期间，杨帆在工作上、思想上、文艺创作上都得到李一氓同志的很大帮助，至今杨帆还念念不忘。杨帆这个文化人以后长期做公安保卫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他说李一氓同志是他的入门之师。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杨帆1月13日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和胡立教同志一起从石井坑突围出去。他们昼伏夜行，通过日伪和国民党军队在山口、公路、运河、铁路和长江上的重重封锁，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2月中旬到达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刚建立不久的军部。他和胡立教同志等，是第一批从皖南突围到苏北的干部，陈毅和刘少奇同志都热情接见，详细听了他们的汇报，并叫他们把皖南事变情况，拟个电稿，发给延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这是皖南突围出来的干部向党中央反映皖南事变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杨帆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以后，很快被任命为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并兼任盐阜区行政公署的保安处长。部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都统一在他的身上。当时盐阜地区九个县斗争十分复杂，日、伪、匪、顽，活动都很猖獗，杨帆在这场复杂万分的斗争中发挥了聪明才智，按照党的方针、政策，为肃清反革命，保卫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的表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来在香港和上海“孤岛”上进行抗日活动的一批进步文化人，随时有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的危险。香港和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千方百计组织他们撤退到“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当时先后到达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人有：范长江、阿英、戴白韬、贺绿汀、邹韬奋、姜平（孙蓝）、胡考、戈扬、陈修良、艾寒松等。新四军军部热烈欢迎他们，把他们

安置在阜宁县卖饭曹村，当地群众把这里叫“文化村”。中共中央华中局还专门成立了华中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这批文化人开展工作。杨帆担任华中文委委员并负责“文化村”的工作，因此同志们戏称他为“文化村村长”。在这期间，杨帆还负责为华中局和军部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曾山、赖传珠等补习文化课，因此同志们又戏称他为“杨教授”。与此同时，杨帆仍担负部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和敌军工作，真是一身几任，忙得够呛。但他干得很愉快，很积极，各项工作都很出色。1942年冬，军部从盐阜区转移到淮南地区以后，杨帆仍留在盐阜区做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可是1943年10月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杨帆突然接到淮南军部的紧急通知，叫他到军部去“开会”。杨帆一到淮南，就被关押起来，说是“重大政治问题”要审查。这时杨帆有如天雷轰顶，摸不着头脑。一个保卫部门的重要干部，突然变成政治犯，而且上了镣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延安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地区和敌伪占领区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是杨帆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被“抢救”成“特务”后，说是杨帆介绍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这下杨帆也成了“特务”了。康生就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立即逮捕、审查特务杨帆。杨帆心中明白，自己是无辜的，在南京戏校时期，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工作一直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他举出了不少党员同志可作证明。但一切辩白都无济于事。杨帆是个硬汉子，不论怎样逼供、提供，他都不说一句瞎话。他心里清楚，那位无辜青年的历史是清白的，是自己介绍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救国会和读书会，他不会是“特务”。

在杨帆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长潘汉年从敌伪占领区工作回到淮南根据地，并参加审查杨帆一案；另一是，在延安的那位无辜青年推翻了原来的供词。这无疑对杨帆都极为有利。

潘汉年在敌区工作时，从沙文汉和其他地下党员那里都听说过杨帆其人其事；在根据地共同工作期间，也了解杨帆的为人。杨帆对潘汉年更是十分钦佩。杨帆通过看守，把自己在狱中写的一些怀念友人的诗词送给潘汉年看。其中有：

梦仲弘军长①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榻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怀一氓同志②

五年一日此相知，爱我良朋诲我师。
料得诧问奇厄久，亦怜亦恨苦无词。

潘汉年读了扬帆的诗以后，也写了一首诗送给杨帆。其中有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实际上是暗示他的冤狱很快就可以昭雪了。杨帆心中感谢万分，写《答友人间》一诗以赠潘汉年：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这首诗中，杨帆吐露了自己的猜疑：这次冤狱可能和自己在皖南时向中央反映蓝苹情况有关。不久，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冤屈的同志陆续平反，杨帆也终于在被关押、审讯十个月之后，得到平反昭雪。他出狱即很快恢复了在保卫部门的工作。

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杨帆担任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任局长。在上海解放后的头几年，他为肃清国民党潜伏特务，及上海市整个治安保卫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3年1月，杨帆积劳成疾，组织上决定他去苏联治病。在莫斯科，他应蔡大姐（蔡畅）之约，一同去探望正在苏联休养的江青。这次探望和谈话，使江青证实了今日的杨帆即是当年知道她底细的殷杨。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这次莫斯科相见，为杨帆以后的冤狱埋下了祸根。

1954年12月31日晚上，杨帆正在家吃晚饭，突然电话通知他去市公安局开紧急会议，一到局里，他就被扣押了。第二天正是元旦，杨帆被押送去北京。从此杨帆的妻子李琼和六个孩子便不知亲人的下落，离别长达二十五年。杨帆到北京被关押后，“预审”了十年，直到1965年8月，才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六年。

杨帆到底犯了什么罪？逮捕时说，1950年2月6日上海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是潘汉年和杨帆给国民党打了电报，并在电报中提供飞机轰炸目标——上海发电厂（当时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负责公安工作）。潘汉年和杨帆是同一天被捕的。其实上海“二·六轰炸”一案，一年后就弄清楚了，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搞的，这个特务已被逮捕镇压了。但十年以后，还要把杨帆判处十六年徒刑。其中奥秘，只有康生、江青一伙知道。就算判刑十六年，从1954年算起，到1970年也该刑满释放了，但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狂热时期，康、江一伙权重如山，怎能让杨帆出狱过自由生活呢？“文革”时期，“专案组”人员审讯杨帆时，问杨帆：“是否知道江青的历史？”杨帆答：“知道。”问：“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答：“当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写过材料给延安党中央，但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专案组”人员多次反反复复地这样问，杨帆都是这几句话重重复复

地回答。以后也就不再问了。1975年8月，北京有关部门把杨帆押送到湖北荆门县沙洋劳改农场“安置”，每月发给他八十元生活费，但还是不准和家里人联系。当时他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只有零点二的光感，生活不能自理，征得劳改农场同意，从杨帆的八十元生活费中抽出三十元，请了当地一位姓李的老农民，帮助他料理生活。这位农民老头，帮助杨帆度过了五年艰难岁月。至今，杨帆和他的亲人对这位老农还感激不尽。

六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也给杨帆和他的妻子儿女带来了希望。杨帆的妻子李琼和儿女们二十多年来一直不知杨帆死活存亡。三中全会以后，李琼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组织部，说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问她的丈夫杨帆是否还活着？这封信很快得到了回答：杨帆还活着。李琼接着又写第二封信给中央，表示她和儿女们都想见一下杨帆。复信又很快来了，说可以，到湖北省问陈丕显同志，他会告诉杨帆的地址。就这样，经过陈丕显同志的帮助，李琼带了儿子去湖北沙洋农场。可是杨帆两眼睛都已失明了，他再也看不见自己曾日夜思念的妻子、儿女了。此时，他的神志也不清楚，不管妻子、儿女如何劝慰，始终不认他们是自己的亲人。李琼母子在农场住了几天，从那位老农和一些管理人员的口中，知道了杨帆在农场五年的点滴情况：

杨帆有两件事，给那位老农及一些好心的管理人员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在他初来农场，眼睛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经常向农场管理人员要纸，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从1975年8月到1976年1月，他不知写了多少信，开头总是这样写：“敬爱的周总理……”内容都是表露对总理的尊敬和倾诉自己受冤的情况。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些信怎能送到总理手上！1976

年1月，周总理逝世了。农场的好心人叫那位老农告诉杨帆：“总理已经逝世了，不要写信了。”杨帆说：“你们骗我。周总理是不会死的。”后来有人把总理追悼会的一组照片拿给他看。他呆了，哭了，放声大哭，跪在地上不起来，整整两天没有吃一口饭。

第二件事是，杨帆在每天“放风”时总要跑步，有时跑得满头是汗。有一次累得倒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还有一次因为眼睛不好，掉在水沟里，多亏一位好心人把他救出来。善良的人们看到他那顽强的样子，不禁想起了《红岩》里的华子良。

李琼回上海以后，又写信给陈丕显同志，请求给杨帆治病。陈丕显同意了，先让杨帆在武汉医院治病，后来和上海市委联系，1980年把杨帆送到上海华山医院动了手术，从脑子里取掉了一个瘤子，杨帆的神志才恢复了正常，思路也清楚了。

1980年4月，杨帆冤案初步平反，结论是：“原判认定的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判处不当，撤销1965年的判决书，宣告杨帆无罪释放。”但并未肯定杨帆一生的功绩，并留了“有严重错误”的尾巴。直到1983年8月，有关部门才作出了新的结论：“杨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和保卫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过去认定杨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杨帆同志的隔离、逮捕、判决都是错误的。杨蒙冤二十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这才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恢复了杨帆的真面目，杨帆及杨帆一家人才真正见了天日。和杨帆一起及因“潘杨”一案受牵连的不少同志的冤案也一一得以平反。

杨帆今年七十四岁，在上海一套公寓房子里和他的家人一起，欢度晚年。他虽双目失明，但脑子清楚，在他妻子和同志们帮助下，正在撰写他一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回忆录。

① 仲弘即陈毅。

② 一氓即李一氓。



一身忠诚 一身智慧

——力学家钱伟长的片断经历

——周文斌——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无锡是个河网密布的富庶的鱼米之乡。与太湖相通的鹅湖，就象一只振翅欲飞的天鹅，给这里增添了勃勃生机。然而，在本世纪初，当西方的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时候，无锡人民却还在忍受着封建主义压榨和资本主义剥削，处于贫穷和愚昧之中。官僚资本主义的触角从上海、南京等城市伸到了农村，掠夺着丰富的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道路上到处可以见到衣衫褴褛的饿殍，鹅湖中流淌着穷人的血泪……

钱伟长正在这种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四十多岁就在

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七房桥有一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

仅过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作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

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薪水略有提高。钱伟长才得到无锡求学，先入了工商中学，后又进了著名学者唐文治所开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再后，插班到了无锡县立初中二年级。不久，又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苏州中学的确不愧为一所极负盛名的学校。那里有幽静的学习环境，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有严格的学习纪律，有浓厚的学习空气。钱穆教文学，杨人楩教西洋史，吕叔湘教中国史，陆侃舆教地理，都对学生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在这里，他很快培养了对文史课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在数学、物理、生物、英语等方面，他的成绩却总是落在后头。这也难怪，直到他考上高中之前，还没有接触过这些课程呢。

这时，父亲突然病逝。接着，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亡。这给了钱伟长极大的打击。家里更困苦了，他只是依靠叔父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在数理化和英语等课程上迎头赶上。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以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那保持至今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1931年，当他拿到一生中的第一张毕业文凭时，他除了继续保持文学、历史的优异成绩外，数理化和英语成绩也赶上来了。

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谁知，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眼前透出了一线曙光：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由于出身穷苦，因而很是同情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他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每年奖励十二名学生。这虽然是一颗蜜果，但要摘取它却谈何容易！

他决心去试试。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不久，他居然同时接

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清寒奖学金”的蜜果真的被他摘到了。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可钱伟长却坚持要学物理。

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攻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的门口，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么。”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想到这里，他深怀歉意地对吴教授说：我的数理化成绩的确不如文史，但我觉得学文史救不了中国。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飞机大

炮，是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我想在这方面尽一份力量。

吴有训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热情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使他的爱国心遭到打击。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还达不到七十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也不晚。”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七十分以上。以后，他再接再厉，使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他又得到了一个深造的机会。那是1939年夏天，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二十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三千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他与郭永怀、林家翘三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三人同时录取。这就使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二十二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

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他们只好返回各自的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们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

一切安排就绪以后，二十二名留学生全都上了轮船。离启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大家打开护照，也都有日本领事的签证。

同学们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当然是没有日本人签证的护照——从上海启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是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

有一天，辛教授把钱伟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你到我这里来，准备做些什么呢？”

钱伟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过去是学物理的，在国内当研究生的时候，曾对弹性力学发生兴趣，并且在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方面有些设想。现在，我很愿意继续以前的研究工作。”辛教授一听，立即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太好了！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合作吧！”

就这样，师生二人很快达成协议，共同攻克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何谓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呢？板是指平的物体。处理板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形，有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处理壳在各种条件下变形的方程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壳的形状本身就五花八门：潜水艇的外壳是椭圆形壳体，飞机机身是不规则的圆形壳体，炮弹弹头是锥形壳体，房顶则有扇平壳、半圆壳、球形壳、筒形壳等等。处理一种壳，就要有一个方程式。甚至对同一种壳，不同学派也有不同的方程式。按照钱伟长的想法，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而复杂的方程式。这些似乎各自独立的方程式之间，必然存在统一的、共同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课题，正是要寻找这种联系。

半年之后，钱伟长终于登上了